

对话蔡晓鹏： 像消灭果蝇一样消灭涉企腐败

■ 本报记者 郝帅

10月15日，在中纪委和全国工商联召集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痛陈广大民营企业经常被“苍蝇”、“老鼠”(指部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滋扰的困境。11月27日，蔡晓鹏将整理后的发言稿以《国缺廉廉鼠辈猖獗》为题发表于博客。一时间，“民营企业家喊话中纪委”引发强烈社会关注。

转眼间“喊话”两月有余。12月17日，蔡晓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所反映的问题虽有一定好转，但离完全解决还有很大距离。蔡晓鹏说，他之所以如此跟不正管制现象过不去，不仅是为了自己企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广大中小企业能有一个良好发展空间而呼吁。在他看来，如果能有一个优质发展环境，广大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急政导致生产线被迫停产

《中国企业报》：为什么会选择在10月15日的座谈会上发声？在发言中提到的各方现在有何反应？

蔡晓鹏：当时会议有房地产、医药、高科技和农业4个行业共12家企业参加，我是唯一的真正中小企业代表。我在会上结合自身的遭遇做了发言，之后又把发言整理发到了网上。中纪委的一个局长和一个处长出席，并在座谈会结束后做了总结性发言，表示感谢大家反映问题，会把问题“带上去”。

自从在会上反映情况之后，涉及的相关部门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根本没有反应。第二种是托我身边的人来打招呼，说不要再继续发声了。第三种是很重视。如公安部消防局、北京市消防局极为重视，领导亲自抓调查工作。北京市领导也做了批示，北京市卫计委针对我反映的情况派人下来核查。政府重视企业家的批评，这是良性信号。

《中国企业报》：你当时反映了什么情况？北京市卫计委成立调查组针对什么？

蔡晓鹏：我在会上举了个例子：修改一项食品标准内的一个数据指标，到相关主管备案部门历时一年半，跑了几十次，直接造成企业一条生产线被迫停产、改产，而这也是急政的典型案列。

2010年左右，我们公司研发了草莓冻干新技术，并引进了相应的生产线。由于冻干草莓是新产品、新技术，国家并没有标准。按照规定没有国家标准就要依照行业标准，没有行业标准就要依照企业标准。2010年10月，

我们在履行完所有手续后正常生产了3年。按照规定3年后复检，在这个环节，食药监局说质监局备案的企业标准作废，要去办一个新标备案，仅卫计委指标修改备案，企业派两个专人跑了几十次，约耗时一年半，最终还是导致了停产，企业遭受很大损失。

《中国企业报》：主管部门提出过哪些修订意见？

蔡晓鹏：仅在文字修改上，我们就跑了16次之多。另外，新增了内审程序外化审批。这个环节名义上是企业内审，但实际上是内审外部化。

主管部门提供了一份专家名单供我们选择，虽然告诉我们可以自己找专家，但我们自己找专家他们根本不承认。报告交了10多次都被打回来修改，而这些修改绝大部分都是对行文的修改，根本不涉及实质。我们想明白后用了他们推荐的专家，还给了这些专家红包。但这些所谓的专家主业多不是搞食品的，本来看数据就能确定的事情非要到现场来，到现场来了现翻书，最后从书上找了一个关于“磷化氢”的指标说我们没有，需要加上。我们找了很多国家级检测机构后发现，这个所谓的“磷化氢”全国没有一家机构可以检测。搞得我们啼笑皆非，但我们的生产线可是实实在在地停了一年多。北京市卫计委就是针对此事成立的调查组。

企业不被盘剥效益可翻番

《中国企业报》：座谈会过去已两月有余，你所反映的问题有所解决吗？

蔡晓鹏：应该说有所改善。以前是市级、区级和镇级各个主管部门的人都会去工厂，以抽检名义什么好拿什么，成箱的搬上车拿走，连白条都不会给我们。现在规范一些了，只会是辖区内的主管部门来抽查。

虽然去场子里的人不那么频繁了，但现在的抽检是不定期的，而且规定所有产品都要以十个包装为单位进行检测，这样的方式会给我们这种企业造成很大负担。

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小批量多品种，产品逐渐向优质化、高端化和个性化发展，单个包装的产品成本和价值都比较高。像蓝莓、树莓、蔓越莓鲜果销售都在二三百元一公斤，加工品更贵。每次抽检，主管部门都要从我这里拿每种单品的10个单位包装检测。我们申报的条码有200多单品，一次就要被拿走2000多件，价值在10万元以上。

我们有一类高端冻干莓果单品，一共四款，每个单品出厂价在1000元以上；仅这一个品类，各抽10件，就是5万元。若一年三次、五次全抽检，压力就大了；若八次、十次抽检，



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

小微企业的利润就被抽干了，干不了。同样的做法如果放在其他一些食品企业上负担也会很大，比如说糕点厂、肉类加工厂、果脯厂，哪个厂都会有很多种产品，如果也是这样一次抽检几百个品种，所有产品每个十个，那么将对企业造成很大的负担。目前，关于抽检细则，我们没看到文件；人怎么说，我们只能照办。

《中国企业报》：你测算过应付基层执法的企业成本吗？

蔡晓鹏：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简政放权、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疯狂劫掠、侵害、骚扰民营企业的“贼盗”行为已有明显收敛。但是，从农业和食品行业角度来说，三农转移支付和食监领域依然还是高腐败领域，成为小微企业遭遇“贼盗”的重灾领域。如果我的企业不被盘剥，利润翻倍是没有问题的。

宗庆后当时有一个很精彩的发言，他说，食品是我们企业生产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质负责。政府管到每个环节，你们又不懂，对生产又不负责，对谁负责？企业还要专门派人来应付你们，现在这种全过程的监管是对企业的干扰。

“草根”创业者将是经济原动力

《中国企业报》：如何防止政府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对企业的盘剥和腐败的产生？

蔡晓鹏：无论是管理过程中对企业的盘剥还是权钱交易都是腐败。腐败有执法领域中的蚂蚁吸食式腐败、拦路抢劫式腐败、资源交换式腐败等多种形式。但无论什么样的腐败，都需要土壤才能生存。我是种果树的，我发现腐败跟果蝇很像。果树需要施肥，所以在果树旁边经常有粪堆，而果蝇就从粪堆滋生，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就去叮咬水果从而造成损失。而将

粪堆推开或进行处理，果蝇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少了。

《中国企业报》：你理想中的企业生存环境是怎样的？

蔡晓鹏：我认为，要将管治型市场向法治型市场转变。要用制度管，不能用人管。现在的市场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来说，由于政出多门，使得进入市场和经营的成本过重。比如说，要想搞一个适合大学生创业的“果汁水吧”很容易，只需要一台自控果汁机和几平方米的空间，只须一按电钮果汁就能自动流出。机器的成本也很便宜，才几千块钱。但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简单项目，手续是按照卫生餐饮的流程来的，还要有建筑、环保、消防等前置审批。如果让大学生自己去跑程序，估计很难跑下来。

这个项目本身投资是不高，但要有经营地点才能注册，如果在繁华地段租地经营，房租就价格不菲，而租地之后去办手续不一定多长时间能办完，但租金一分不能少交。之后还要这个那个一大堆手续、开门费，办好了还不停被骚扰。这些成本，是绝大多数初期创业者无法承受的。

《中国企业报》：如何看待草根创业者的未来？

蔡晓鹏：我当过知青，农村基层干部，是从农村出来的，务农经商也近30年。我认为现大批来自城乡的年轻创业者们有知识、有梦想也有干劲，他们渴望自主创业，对市场充满激情。但这些数亿量级的“草根”也是压力很大的群体，因为他们由于资金少，加上管控、成本等多重原因很难进入市场，而就是进入市场，也大多生存艰难。如果能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经济环境，那么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找到了，自主就业率提高了，社会也安定了，城镇化进程都会大大加速。如果有足够好的发展空间，他们一定能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实习记者苏浩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纵深



边垄断边亏损 “水老虎”何以小官大腐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前段时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其贪腐程度触目惊心，成为小官大贪的典型案列。

自来水公司是社会福利性企业，本身就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换句话说，各自来水公司在当地有着绝对垄断地位。但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通常会为自来水公司进行相应补贴，但这仍然不能阻止相当比例的自来水公司亏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小官大腐？

尴尬的供水垄断

自来水公司虽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户一表改造和供水管网改造费用由政府出资转由企业全部承担，实际上，从那时起供水公司便成为一家真正自负盈亏的企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制度和民营部门开始不断进入从前被国有部门垄断的一个个领域。政府已在制定水价改革试点方案，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推出新一轮水价改革政策。未来将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鼓励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继续完善行业民营化历程。

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制垄断相联系，消除行政垄断意味着国有资本要放弃对相关领域的控制，而水务、交通、通信、金融、石油、石化等行业均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我国不能因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放弃对这些领域的控制。

事实上，自来水行业在打破垄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民营与国企争夺供水行业“特许经营权”就从未停止过。

2005年10月，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实行市场化改制，由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参股50%并成立了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彼时，秦皇岛市公用事业局仍然是新公司的主管上级。但在2009年的秦皇岛市机构改革中，供水管理机构从市公用事业局并入了城市管理局。

仅仅两年之后，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成立，但它却拥有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国有独资企业等注册，此时，它已是名正言顺独立于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之外的实权派。

但问题是，重新回归垄断的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却处于亏损运营状态，近三年平均每年亏损1280多万元，还有大量欠款。

“这实在让人纳闷。”社会学家郭克说，上赶着赔钱让这种供水体制显得有悖常理。

他告诉记者，供水公司是福利性企业，因其涉及百姓福祉，这就造成水务公司是重资产行业，是财务成本高、折旧高的行业特征。

“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价不能随便提，而折旧、贷款利息等成本高于利润现象的发生，供水公司即使亏损却仍在经营也就不足为怪。”郭克说。

上述学者认为，作为公益性行业，供水企业绝对不可能出现暴利的现象，现行的水价机制，体现了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规律。

亏损之谜

本世纪初，很多二、三线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很高。加上水价长期偏低，一些自来水公司连年亏损，而当地政府恰巧没有资金改建管网，于是洋水蜂拥进入中国。

“但那个高利时代也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山西水务系统的退休人员张力说。他说，作为公益性行业，国家很快便出台了相关规定以制止水价上扬之势。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可以说都是挣了钱的。

2009年，由外资企业染指的上海、深圳、兰州、天津等城市纷纷传出水价上涨的消息，价格先后上调数次之后，广州、洛阳、宁波等地的自来水公司一路晒单以亏本为由要求上调水价。

其中广州三年亏损6.5亿元。成都公布的数据称，2007年，亏损达21601万元，政府补贴6732万元；2008年，亏损30323万元，补贴22138万元。

但这只是开始，亏损并未止步。

“2012年之后，我国还有近30%的城市水厂亏损。”上述水务研究人士说，这其中包括众多三线城市。

2012年11月23日，保定市供水总公司在《城市供水企业基本情况表》中提到，2008年至2010年的三年间，该公司年亏损额分别为1987万元、3766万元、4231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年间，该公司的年职工待遇由21054元增至32212元，年增幅分别是30%和17.67%。

2014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首次在其官网公布了2010年度至2012年度的企业基本情况表以及企业成本表。

现行居民水价4元/吨，即1.7元/吨的自来水水费、1.26元/吨的水资源费和1.04元/吨污水处理费。按照企业3.19元的售水成本计算，居民使用1吨水，支付水费1.7元，企业要亏损1.49元。

因此可以看出，自来水成本已经高于售价。而表中显示2010年和2011年，售水成本分别为2.98元/吨和3.17元/吨，依此计算，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市自来水单位成本价连续三年高于售价。

(下转第六版)

相关



降息语境下中小企业融资难未改观

■ 本报记者 郝帅

自11月22日央行降息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月。对于央行降息，有相关专家认为企业将得到益处。但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则表示，央行降息未惠及企业。

早在央行刚降息之时，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就表示，基准利率下降之后，对于某些企业来讲，可能商业贷款利率下降的幅度还要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应该是受惠最大的。

“现在利息浮动，我去问企业是不是利息降低了，他们说一点也没降。”12月13日，全国工商联名誉主

席黄孟复在三亚财经论坛上表示，央行11月的降息并没有惠及企业。

黄孟复提到，目前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贷款年利率在6%-7%，而民营企业的贷款年息在15%-20%。在他看来，企业的利润很难承受这么高的利息，“很多企业抱怨自己是替银行打工”。

黄孟复说：“而近期央行的降息也并没有让企业受益。如果资金大量进入实体经济，利息肯定会降下来，但现在资金充沛的流动性只是在实体经济的外围转。”

黄孟复认为，跟西方银行靠金融增值服务赚钱不同的是，中国的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仍依赖息差，这需要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改革。

12月18日，已经从事文化产业

多年的郭姓企业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从银行贷款还是民间融资角度来说，利息都没有降低。

“为了经营需要，我的公司年初在银行贷了100万元，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利率波动的通知。而到了6月，我又以每月2.7%的利息从民间借贷公司借了60万元，也没有变动。”郭姓负责人表示，“今后的发展中还很可能遇到资金瓶颈，很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银行贷款还是首选，但我最近去银行问了，好像在利率上没什么降低。即便降低了，银行不贷给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意义。”

一家外贸企业负责人也认为，对外贸企业而言，相比利息的减少，他

们更关注能否获得贷款。

代表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初创型小微企业，迫切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针对这样的情况，已经有相关人士提出了解决方案。

12月13日，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呼吁，修改《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现行法律，让具备实力的银行、投资企业的债权可以转化为股权，银行的资金不再是存和贷，这将释放出银行资金的活力，让银行更勇敢地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它们发展。

“硅谷之所以孕育出那么多的伟大企业，并不只是其创业氛围，还在于硅谷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马蔚华说。